



《现代潘素纸本设色仿展子虔游春图》。



故宫博物院馆藏《游春图》。(资料图片)



潘素



张伯驹



张伯驹与潘素晚年照。

后来实在无从下笔了，才恋恋不舍地题上“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”。

文傲的画经过乾隆的手，自然少不了留下他的印记，所以，这幅画作曾经在如今的故宫里停留，后来被赏赐出来。

接下来，它的经历在李在铤的附纸题跋中提到：“……此卷为故友周苍生大史所藏。苍生继娶文氏为两江旧族，习礼明诗，前后二文可称双美。下聘时即以是为纳采之物，尤为佳话。乃结褵未久而文氏逊谢红尘，阅数月苍生亦修文地下。其兄持此卷出售，余观之戚然但恐为俗子所得，亟以重值易之。”

也就是说，此卷被主人的故友周苍生大史收藏，是他继娶文氏下聘时的纳采之物，周苍生夫妇去世后，李在铤重金购买收藏。

赵尔巽将画作带到青岛？

几经辗转，画作被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收得，赵尔巽出生于辽宁铁岭的官宦世家，曾授翰林院编修，辛亥革命后隐居青岛，自比为义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，声称“青岛就是首阳山”。1914年3月，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，为《清史稿》耗尽心血。

《明文假名葩异卉图卷》与赵尔巽有过短暂的缘分，也或许是他将这件精品带到了青岛，经过多年之后，它停留在了青岛市博物馆，向青岛人展示了一位明代才女惊人的技艺。

“青岛市博物馆还藏有文假花卉册，共10开，属款‘赵氏文假画’。保持其简洁构图，纯熟的没骨笔法以及艳丽的用色，在花卉的兼工带写上，比《明文假名葩异卉图卷》工笔的成分稍多一些，从画风用笔来看，稍显工整多率性少一些，应该是比手卷要稍早的作品，但也是其较为成熟期的作品了”，赵好副馆长说。

一幅精巧的画卷，一位兰质蕙心的佳人，二者合二为一，旖旎而来，如诗如画，如歌如诉，在历史的星空里留下了永恒的情影。

潘素送画

原作献故宫，临摹《游春图》送青岛

明媚春光里，湖阔山青。数座院落，散处山林之间，游人或乘骑于山径，或泛舟于湖上，或独伫于门头，或步行于湖滨，姿态各异，生动有趣。远山浮翠，白云缭绕，飞瀑流泉上虹桥如贯。树发新枝，嫩蕊初露，桃花绽开，绿草如茵，一派春和景明的景色。这是展子虔《游春图》所绘的美丽景色。

画内画外，皆不一般

展子虔（约545~618年），隋代绘画大师，渤海（今山东惠民何坊街道展家村）人。历经东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朝，到隋代为隋文帝所召，任朝散大夫、帐内都督等职。展子虔擅画佛道、人物、鞍马、车舆、宫苑、楼阁、翎毛、历史故事，尤长于山水，被后世誉为“唐画之祖”。

在《游春图》之前，山水在画中依然是人物的陪衬，水面狭小不能泛舟，峰峦低矮似是土堆，但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则大有改善，因此画史称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。

仔细观察这幅画，色彩浓丽厚重，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膏、石绿颜料赋色，以青绿的色彩为主调，建筑物和人物、马匹间以红、白诸色，既统一和谐，又富有变化。亮丽的色彩亦更好地衬托出大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。

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《游春图》并非原件，而是张伯驹的夫人、画家潘素临摹的画作，名为《现代潘素纸本设色仿展子虔游春图》（设色青绿山水）。画作上，还附有书法一幅，是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的题跋：“隋展子虔历北齐、北周至隋文帝开皇九年……兹更重临一卷以赠青岛市博物馆。”讲述了展子虔《游春图》流传经历及潘素临此画并赠本馆的事迹。下钤“伯驹长寿”白文方印和“丛碧八十后印”朱文方印。

这是因为，《游春图》串联着百年前的世事沧桑，激荡起一个时代的历史痕迹，是张伯驹毅然出手，救下了国宝，并将它捐给了故宫。也就是说青岛的《游春图》是捐赠者临摹下来专门赠给青岛市博物馆的，是《游春图》的分身，更是历史沧桑的承载者。

卖房卖首饰，救下国宝

“此画为北京书画商人所取，1948年夏，余以重价向古董商人购得，遂未致刘氏国外，归故宫博物(院)保藏，曾由爱人潘素临一副本，兹更重临一卷，以赠青岛市博物馆。戊戌冬中州张伯驹题记时年八十一”，张伯驹题跋说。

可以说，《游春图》是张伯驹“救”下来的。“最初，《游春图》经宋徽宗题签，约在宋室南迁之际即行散出，明朝初年，《游春图》卷收归明内府，而后又归权臣严嵩所有。万历年间，画卷为苏州收藏家韩世能所藏。入清后，经梁清标、安岐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，后清王朝走向灭亡，此画随溥仪出宫被携至长春伪满洲皇宫的东楼收藏。日本投降后，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，《游春图》也流落东北民间”。

1946年初，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界开始陆续出现。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，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。《游春图》这幅无价之宝已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蟠忱，从长春一家古玩店花很少的银子买下来了。穆蟠忱回到北平找到琉璃厂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，他们认为这是个发大财的好机会，想暗地设法同沪商联系，悄悄将此画转手洋人，以获巨额之利”（《张伯驹与〈游春图〉》）。

得到消息后，张伯驹非常着急，立刻找到马霁川购买《游春图》，马霁川开价800两黄金。张伯驹知道他们收购的价格很低，而且

这个价格他倾家荡产也买不起，于是张伯驹一面请人从中斡旋，并报告故宫博物院，请求不准此画出境；一面走遍琉璃厂的古玩铺子，放话：《游春图》属于国宝，此画卷万万不能出境，否则将会是中华罪人。

如此以来，满城风雨，马霁川迫于舆论压力，只好同意由墨宝斋的掌柜马保山作为中间人出面周旋，洽谈《游春图》由张伯驹收购一事。经过商谈，马霁川、穆蟠忱最终同意要价200两黄金将《游春图》卖给张伯驹。

为能尽快得到《游春图》，以免节外生枝，张伯驹只好忍痛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。这是一处豪宅，原为大清太监会李莲英私邸，也是张伯驹最有价值的家产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不够，夫人潘素又将自己的首饰卖掉，这才凑成了足金130多两，张伯驹答应尽快想法补齐，并由马保山担保，才算购得《游春图》，后经几次补交，只补足到170两黄金，终因时局变化不了了之。

虽然后来多人曾要高价收购《游春图》，但都被张伯驹拒绝了：“凡经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，一概不转卖给别人，不管他是谁！”1952年，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、唐伯虎的《三美图》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

这就是《游春图》的曲折经历。就在之后一年，据《张伯驹年谱》作者荣宏君先生考察，1953年，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以及启功、惠孝同等人来到青岛，到书画家黄公渚观海二路3号的寓所中泼墨交流，诗词酬唱，是为青岛著名的雅聚。此后，张伯驹多次来到青岛，办展避暑。张伯驹和潘素夫妇临摹捐赠《游春图》的时间应该为1978年，“兹更重临一卷以赠青岛市博物馆”，足见张伯驹夫妇对青岛印象之好，感情之深。